

经济特区之“特”的历史回顾与现实意蕴



□谢涛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里面专门回顾了经济特区的初创历程，并提到党中央赋予广东“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邓小平为“特区”命名，颇有深意。从通常意义上讲，我们很容易将经济特区之“特”等同于“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层面之“特”。经济特区创办初期，这一认识很普遍，事实也如此。一方面，特区是因“特殊政策”而生而兴，另一方面，特区又在“特殊地区”之外。1980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松下电器公司最高顾问松下幸之助时说：“我们广东、福建当作特殊地区，在广东靠近香港的地方设立一个特区，欢迎各国的资本在那里投资设厂，参与那里的竞争。”然而，随着经济特区建设日益推进，其身上承担的改革开放使命和彰显的标本价值越发凸显，“特”字的含义自然也就越来越丰富，早已远不止于“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

中央的深情厚爱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40多年来党中央对

广东特别是深圳经济特区的寄予厚爱、高看一眼、深情关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全力支持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发展工作”。如果仅仅把深圳等经济特区之“特”看做简单的“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未免格局太小。这个“特”的背后，蕴含着的是党中央一以贯之的重大“战略意图”。40多年来，党中央在“战略意图”上对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创办、在1980年就从未中断。以党中央最高领导人在关键历史节点亲临考察的频次为例，深圳可以说是国内城市中最为瞩目的“明星”之一。众所周知，邓小平在1984年和1992年这两个节点上，先后于1984年（两次）、1994年、1995年、2000年等时间节点多次亲临深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阶段。江泽民参与了深圳经济特区的创办，在1980年就10多次到深圳考察，担任党的总书记后，又先后于1990年（两次）、1994年、2011年亲临深圳考察。党的十八届后，习近平总书记不到8年的时间内已先后于2012年、2018年、2020年3次亲临深圳，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迈入新时代。除亲临考察以外，40多年间，党中央最高领导人还多次在不同时段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作出具体指示，这里不一一赘述。正因为有此厚爱，深圳

特区的使命所系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之中勇挑重任、“杀出一条血路来”的独特使命。政策之“特”源于使命之“特”。深圳等经济特区为什么能获得特殊政策，地缘人缘因素固然是前提条件，但实际上，中央基于重大“战略意图”之下的独特使命赋予，才是决定因素。梳理改革开放史，我们发现，在特区建立之前一两年间，中央对于改革开放早已形成了决策共识，只不过一直在寻找突破口。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特别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广东省委的积极要权，广东、深圳才成为这个独特使命的承担者。中发〔1979〕50号文要广东“先走一步”，邓小平又要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广东、深圳承担起为改革开放破冰开局的独特使命。对此，我们从当年习仲勋的讲话中可窥一斑。

永葆的改革基因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

们更应看到深圳等经济特区改革者身上不惧风险、冲锋在前、一马当先的改革基因。习近平总书记说，经济特区要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这句话其实是对特区改革基因最生动的概括。这一基因，早在特区创办之初的岁月，就已深植于特区人民的心中。中央要广东、深圳担任破冰开局重任，事事优柔寡断，遇到困难就踟躇不前，肯定是不行的。特区创办之初，因为种种原因，进展曾一度比较缓慢，没有达到中央、省委的要求。对此，谷牧提出：特区“要有点孙悟空的精神，受条条框框束缚不行，要改”。他还针对当时京津沪等地有人提出来的“现在不怕如来佛，就怕唐僧的紧箍咒”，特别寄语特区：“你们要大干，要有孙悟空的精神，要搞活”。“孙悟空的精神”这个比喻，不只谷牧，习仲勋、任仲夷等很多身处广东、深圳改革开放破冰开局第一线的领导者也都是反复强调的。在任仲夷主政广东时期，更是提出“排湾不排外”“特殊政策真特殊、灵活措施真灵活、先走一步真先走”“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等振聋发聩的口号。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有这批改革先驱种下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种子”，深圳等经济特区才不负中央重托，成功突围，最终成就出20世纪80年代这一改

革成果井喷、改革气质凸显、改革氛围浓郁的黄金时代。从打破“铁饭碗”到“孔雀东南飞”，从“实行四分钱奖金”到“率先终结票据时代”，从“土地第一拍”到“科技第一展”，随着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种子”不断发芽壮大，改革基因成为深圳等经济特区最显著之“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很多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不亚于40年前”，深圳等经济特区要继续写更多“春天的故事”，改革基因更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传承的精神气质

一想到经济特区的“特”，我们更应看到深圳等经济特区建设者身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气质。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形象描述了这一精神气质：“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概括了这一精神气质：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追溯特区精神之源，可以回到1979年开始的基建工程兵参与深圳经济特区创办的现场。当时，深圳基建几乎为零，建设力量极度紧缺，于是，

两万解放军基建工程兵先后来到了这里，面对荒草没腰、鼠蛇窜行、一穷二白的现状，迎难而上，缚茅为屋，栉风沐雨，成为特区拓荒的中坚力量。短短数年间，深圳得以在一片荒原中创造出“一夜城”的奇迹，这批“拓荒牛”当记首功，“拓荒牛”自然也成为“特区精神”的最初象征。1984年春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源于深圳的口号得到邓小平充分肯定，成为“特区精神”又一鲜明印记。此后，“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992年）、“鼓励创新，宽容失败”（2006年）、“来了就是深圳人”（2012年）等观念从深圳响彻全国，“特区精神”被赋予了实干、互助、包容等新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总书记要特区保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风雨无阻的精神状态”，其中的主旨，就是要特区广大干部群众能够传承好、发扬好特区独特的精神气质，继续勇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拓荒牛”。

从历史的角度看，随着时代形势的变化，今后深圳等经济特区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向中央要特殊政策已经不太可能，只有充分发挥自身已经之“特”，真正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以思想破冰引领改革突围”，才是唯一出路。（作者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处长）

用“四个坚持”防范化解新时代风险挑战

□刘秦民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承载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领导推进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理论创新成果的最新文本，是当前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权威教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基于“两个大局”的判断，提出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特别是在实现党的十九大的宏伟战略蓝图过程中，我们要经历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包括自然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国际风险等，成为我们增强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的重要指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风险的力量之源

新时代党的生死存亡直接体现在我们党能否始终同人民群众紧紧联系在一起。根据列宁的政党理论，威胁党的长期执政的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脱离群众。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论证共产党的利益立场时，就明确表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其意思非常明确就是指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利益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特殊利益。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新的历史节点，依然坚定地人民的满足感、获得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依归。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这一定格理念，是根据新的时代和新发展阶段提出的新思想，这一思想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新时代的新展开。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这一理念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使中国从人民最终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变得富起来和强起来。今天站在新的历史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围绕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谋福利这一核心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一发展思想。“我们能够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积极性。”习近平总书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的力量源自人民，要尽最大可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心里想着人民，依靠人民，才能把为人民造福的千载伟业继续推向前进。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过程中防范化解了无数风险，这其中有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紧密结合时代条件，以新的视野对执政、建设以及发展规律的把握，在维护人民群众普遍利益的基础上开展一切工作。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风险，不惧风险，沉着应对风险，取得一个个伟大胜利，事实证明，我们党能立于不败之地，就是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于力量之源的科学认知。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风险的持续动力

问题倒逼改革，4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与果断的政治决断，带领全体中国人民以解放思想

为前提，依靠解放思想变革固化体制，硬是开拓出一条致富路，一条发展新路。如果说这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富起来，那么党的十八届后，习近平总书记以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为基础，凭着非凡的勇气继续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新的境界，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就，就是党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强起来的现阶段。他用崭新的思维和全局的视野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大潮，他从新时代中国面临全新的问题及风险挑战，从通盘考虑国内外局势出发，提出了改革开放对于中华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是党带领中国人民在面临外部风险频发的境遇下的关键选择，这种选择不是暂时的，而是贯穿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的主线，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持续提供强大动力的关键一招。

今天的改革开放承担着双重任务，既要解决过去留下来的“欠发展问题”，又要解决发展起来以后不可预知的新问题，既要解决过去改革遗留的问题及时清理，又要面向未知的探索和创新，今天的改革和四十年前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差别，表现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和解决问题的速度上都截然不同。如果说欠发展是解决基础性的零发展、负发展问题，那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就是着重解决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问题，是总体具备一定的发展高度之后，在新的发展阶段向更好、更高的发展阶段迈进要解决的问题。面对改革进程中不可预知的“风险”及“困难”，习近平总书记在做好应对“风险”的同时，还自觉、主动地预防、防范这些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过程中还处于蛰伏阶段的风险。

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全体人民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与根本落脚点，牢牢把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从注重突出“改革的全面性”到强调“改革的全面深化”；从注重“问题倒逼改革”到强调“思想引领改革”；从注重缩小“发展差距”到注重突出“制度优势”；从注重“杀出血路”到重在“挖掘新路”，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华彩乐章，为党防范化解改革风险提供了强大动力。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风险的政治根基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是否具有稳定性、持续性，关键在于政党的能力，政党的能力越强，那么该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就能有较好的政治基础，对其实现现代化及其政治文明的发展乃至该国的一切发展都影响深远。在今天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一个发展中国家想既要保持好的发展，又想要达到高水平的政治稳定，其背后显然离不开强大的政党支撑。新中国70多年发展的实践证明，要想办好中国的大事小情，没有党的领导是无法想象的。新中国自成立至今70多年，不仅是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的过程，也是逐渐展现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过程，当今中国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心。共产党持续不断地自我改革，自我建设，坚持不懈地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汲取经验，在应对各种风险中，及时总结经验，展现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推向一个新高度，离世界舞台中心愈来愈近。虽然取得可喜的成绩，但总书记却时刻有着“问题意识”，并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推进党的全方位改革，实现从严治党。在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接近实现伟大复兴的节点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告诫全党，“同志们肯定知道温水煮青蛙的故事吧，杭州雷锋塔是如何倒塌的吧？”针对党内腐败而产生的执政风险，习近平总书记狠抓党内政治生态，从党建战略和方略上，全方位推进党的建设，其逻辑起点是不忘初心，补足精神之“钙”；重点突破，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关键要害，腐败无禁区，实现零容忍惩治腐败；决定环节，好干部的选拔尤为重要；基本保障，是制度治党且贯彻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固本之策，是把基层打牢作为长远之计；全新课题，是通过网络管党治党；永远赶考，是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以全面从严治党，赋予党的建设更具体系性的发展基础，为党防范化解执政风险提供了全新的理论高度。

坚持弘扬中国精神，是新时代防范化解风险的基本法宝

根据学界的普遍看法，中国精神的内容具有历史与现实二重特性，具体体现为“由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它们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淀而成的，并渗透到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液中，它们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经历了无数灾难，抵御了无数风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都是中国精神在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奋发进取。习近平总书记曾高度概括地指出：“新时代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去实现中国梦，这种精神是新时代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精神的这个表述，是应对新时代、新发展、新要求，对中国精神应有的时代价值的新阐释。

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思想的提出，正是顺应当代中国发展的总趋势。目前，在实现中国梦的前进道路上依然存在各种风险和艰难险阻，中国梦反映出当代中国正在向更理想、更自信的发展道路上前行，在面对新的难题，例如“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结构改革转型等风险，当代中国能否继续推进改革顺利等进行等各种国内外难题，都还需要继续依靠弘扬和培育伟大的中国精神来获取更强的精神动力。新时代中国取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伟大的，但是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时代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对新的风险，中国梦、中国精神是凝聚最大社会共识的关键。由此，中国精神的作用在新时代尤为突出。正如鲁迅所说：“民族是最宝贵的，只有把他发扬，中国才有进步。”

（作者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团队培育项目“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问题研究”（2019SKTD01）；广东教育科学规划《中国医学融入中医院校思政教育研究》（2019GXJK030）的阶段性成果。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策略

□周静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等严重危害及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相对于一般的公共事件，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严重破坏性、高度关注性、极端危害性等特点。借由全媒体平台的技术加持，每一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都极易形成重大的舆论危机，给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严峻挑战。面对“热点时刻”，如何打赢这场没有硝烟却异常激烈的战争，是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困境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爆发创造了全新的社会场域，形成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其后果不仅是导致物质的损失、人员的伤亡，更是成为各种观念、思潮、意志、情绪等进行深层次较量的“角斗场”和“竞技场”，充满着国际与国内、主流与非主流、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权力关系的博弈。

世界场域：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加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他们选中的一个突破口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在新冠疫情这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他们更是以此作为突破口，经济上频频发动贸易战、信息战，不惜动用国家资源打压、抹黑中国一些科技企业；政治上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挑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血肉联系。同时拼凑国际反华联盟，不断丑化、污蔑中国，妄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威胁中国的政权安全。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言论和行为背后体现的是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较量。

中国场域：社会思想意识多样化。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爆发后，因其极端重大、破坏性等特质，引发民众的强烈关注。人们审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视角多种多样，更加剧了思想的高度分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裂变。例如在新冠疫情中，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为代表的各种非主流、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利用群众在疫情期间的恐慌心理，企图借助新媒体平台公然否定中国人民的抗疫文化和抗疫精神，干扰人们形成正确的英雄观、历史观，企图摧毁人们的精神高地……可以说，这些多样、分化的思想意识中所蕴含的消极的、错误的因素不但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恶劣的负面影响，还严重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和主导地位。

个人场域：个体意识结构严重失衡。现代心理学认为，意识结构是指人脑在反映事物过程中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各种基本认知和意识内容，主要包括知识和信念两个层面。以新冠疫情为例，这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规模最大的流行传染病，是人类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大灾难。疫情中人们的身心和心理都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既有的知识几乎被颠覆，个体固有的稳定感和安全感丧失，导致“危机迷情”、心理失控和信息崩塌。个体意识结构的失衡，信息扩散的负面效应都极有可能带来网络舆论的混乱和社会秩序的瘫痪，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持续耗散，给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带来重大挑战。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策略

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表述和思想表达，是文化自信、精神追求和社会理想的集中体现。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为党和政府为处理重大突发事件而实行的一系列相关政策、措施和制度。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维系着政权的稳固、社会的稳定，还关系到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发展和解决的指向。因此，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切实提升传播实效、增强传播效力，以增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有效性，提高其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

第一，牢固树立阵地意识，实现传播理念主动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去占领，就会丧失主导权，其他社会思潮和错误观点就会借机攻城略地，挤压主流意识形态空间。由于重大突发事件而引发的公共性危机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和极强的破坏力，政府部门必须始终有明确的阵地意识，要通过多次主动、积极地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表相关声明，对于人们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要及时运用真实、具体的数据和事例进行回答和解释，减轻人们因不明事态真相产生的不安和恐惧。此外，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斗争意识，在党的重大刊物和主流媒体上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出现的错误思潮进行揭露和批判，及时“亮剑”，占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高点。

第二，重视受众需求差异，推动传播话语个性化。受众是信息传播的客体与“目的地”，是传播链条的重要环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关系到人民群众安全、健康等切身利益，而不同的受众个体因对环境、身份、知识、能力等的区别对信息需求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实践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在坚守根本性原则的基础上必须进行话语的不断“降维”，即针对

对不同受众进行技巧性的“解码再编码”，实现化繁为简、化抽象为具体、化晦涩为通俗。具体来说，应充分运用现代传媒的技术和功能，将意识形态中比较抽象的价值理念、文化内涵、精神结构等，以人民群众更容易听得懂的感性故事、影视符号或文字作品等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超越理性概念与感性传播的局限，实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群众接受的有效“对接”，增强传播的生动性、形象性、丰富性。

第三，运用多种传播手段，促进传播模式大众化。大众传播模式强调媒体、政府与民众的信息互动，主张综合运用和扩展多种传播主体的力量，共同推进意识形态更广泛、更多样的传播，代表着突发事件中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模式变革的新方向。当前，新媒体取代了传统的书籍、报刊等载体，成为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场所，因此必须依托新媒体平台建立起意识形态大众传播的新阵地。一方面，要坚持主流媒体的传播主导权，充分运用新媒体传播的新技术、新手段，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另一方面也要积极调动商业平台、意见领袖等社会的、民间、大众的力量共同做好传播工作，引导他们主动承担起宣传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的责任，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染力、认可度和实效性。

第四，加强网络舆论引导，营造传播环境国际化。面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国际国内反动势力借助全媒体平台“群魔乱舞”的现状，必须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和舆论引导，营造清朗的传播环境。首先要通过构建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格局和舆论引导工作机制，牢牢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不动摇，以提升话语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和话语支撑。其次，要加强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不仅要通过反复、不断流动的主流话语和政治符号实现日常传播资讯的主导性覆盖，而且要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这个“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完成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整合与认同性建构。最后，对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企图“妖魔化”“污名化”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对外宣传和回应，始终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为疫情防控营造清朗、和谐的国际舆论氛围。

（作者为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是2019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为例”（项目编号：GD19CMK01）的阶段性成果。